



抗日战争中党领导动员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王春晖

引言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展普遍深入、坚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努力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战积极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动员工作，梳理总结其中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全民族的战略动员

1931年，日本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相继侵占中国东三省，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倡导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瓦窑堡会议中，中共中央通过分析日本入侵中国后社会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策略任务。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国民会议。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先后打退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全民族抗战顺利进行。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号召着全中国的各党派各界各军，号召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号召着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钢铁长城。

战略动员是国家为应对重大安全威胁、维护核心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系统性措施，是连接和平与战争、平时与战时的桥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战略动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进战略动员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防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共产党致力宣传民众和发动民众，开展持之以恒的政治动员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动员民众才能取得胜利。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动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这个政治上的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为了达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利用报纸、广播、传单等宣传工具加强舆论引导，宣传抗战意义和党的抗日主张，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抗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开办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等各种文化补习班开展民众教育，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得以不断觉醒，抗战热情得到极大提高。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进抗战文艺创作，利用电影、歌曲等媒介进行生动的文化宣传，有效动员民众积极投身抗战。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通过不懈深入地动员和发动民众，使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血肉联系，激发出蕴藏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取得了最为有效的政治动员效果。

政治动员是国家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共识、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政治动员的内涵与形式不断拓展，其重要性更加凸显。加强政治动员不仅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中国共产党创建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开展军民一体的武装动员

兵民是胜利之本。党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特别重视对武装力量的建设，通过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根据抗日战争中动员群众的广泛性和战场的广阔性，在广大解放区战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主力兵团为主，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为补充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各抗日根据地，以民兵为主的人民武装与主力部队并肩作战，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极为有效的游击战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时，民兵队伍的壮大也为正规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通过开辟广大敌后战场，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逐步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两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抗击了58%至62%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1万余次，成为抗战中坚力量。至抗战结束，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

武装动员是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将武装力量由平时体制转为战时体制的措施和活动。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武装动员必须深入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特点规律，探索新的武装动员理论，注重系统集成，强化科技驱动，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武装动员体系。

中国共产党改善人民生活 and 致力发展经济，开展卓有成效的经济动员

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得不到保障。抗战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充分认识到对群众的动员不能只是为动员而动员，而应该坚持一边抗战一边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提高军民抗战积极性和保障能力。通过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所受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有效缓和农村各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针对日军扫荡、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359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为“陕北的好江

南”。我们党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对根据地工商业建设作了初步尝试，通过发展小手工业，创办公营企业和发展军需工业等方式不断推动商贸发展。这一时期，党把发展经济作为重要任务，以满足民众的利益为首要前提，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保障了战时经济自给自足，更赢得了民众对我们党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经济动员是加强国防经济潜力建设和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措施，是遏制战争的强大威慑力量，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动员应以创新的思维、务实的态度、有力的举措，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动员协调发展，推进经济动员体系的转型升级，确保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时，能够快速、高效、精准地动员所需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组织和抗日团体建设，开展广泛深入的组织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外环境十分复杂，但党始终把党员培养与党组织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党员人数锐减，党组织活动受到影响。为扭转这一局面，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中提出扩大与巩固党组织的政策。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获得迅速发展。为巩固日益发展的党员队伍，使广大党员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毛泽东同志推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促进全党团结和思想统一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普遍实行三三制原则，党的组织号召力得到极大提高。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类型的抗日团体，深入分析把握各阶级、阶层的特点，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组织动员，真正实现了全民抗战。

组织动员是党凝聚力量、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组织力量，是我党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组织动员的对象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组织动员的方式和手段需要不断创新，以提升组织动员的效率和效果，真正发挥出组织动员的整合力、凝聚力、战斗力。

群策集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积极抢占军事理论战略制高点，研发契合未来战争需求的前沿理论成果，已成为牵引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受技术迭代、多元交叉、实践检验等影响，世界军事理论创新存在诸多误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动力不足、活力不够、方向偏离、质效低下等问题。只有谨防军事理论创新走入误区，打破军事理论创新困境，才能以理论研究引领战争实践创新发展。

谨防“空中楼阁”之误，要脚踏实地。智能化、无人化技术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广袤空间，但部分研究却陷入脱离战场实际、超越技术承载的误区，这些理论创新不仅无法为作战指挥、战法运用等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还可能消耗大量研究资源，错失军事技术研发与装备建设的重要机遇期。美军“未来战斗系统”的新战便是如此，由于设计理念过于理想化，试图整合大量尚未成熟的前沿技术，未充分考虑实战中的复杂性和成本限制，在历经6年、耗资数百亿美元后被迫终止。军事理论创新应当立足硝烟弥漫的真实战场，深入研究作战部队的实际需求，杜绝盲目追求技术堆砌，要建立合理的技术评估机制，对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有效验证，在技术可行性与战略实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务实求真的态度开展研究攻关，切实推动理论创新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谨防“闭门造车”之误，要广开思路。军事理论研究中“闭门造车”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将以往经验奉为主臬不思变通，有的沉溺于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推演，有的对军事变革浪潮与颠覆性技术冲击缺乏深刻认识……凡此种种，其结果必然是理论严重滞后于战争形态的演变，最终在实战中酿成灾难。二战初期，波兰军方仍坚持“骑兵迂回、步兵固守”的线性战场，忽视了坦克与机械化部队作战效能的发挥，在作战计划制定上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面对德军“闪电战”这一新兴作战理论与装甲集群的协同攻击，波兰军队的作战体系瞬间崩溃，最终导致国家迅速沦陷。军事理论创新应突破固有思维定式，以开放多元的视角破局，既要深入部队一线，将战场需求转化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也要搭建军地融合、跨域协同的交流平台，在思维碰撞中催生颠覆性作战理念，持续推动军事理论研究向实用、前瞻、预测等方面转型。

谨防“单打独斗”之误，要交叉融合。现代军事科学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领域技术融合集成的趋势，在研究中如果仍采用传统的线性、分散且封闭的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应对复杂军事问题的挑战，更会限制军事理论研究的创新活力与发展空间。1982年贝卡谷地空战是多技术融合制胜的范例，以色列军队以无人机诱饵诱使叙军雷达开机，电子战飞机锁定信号源实施全频段压制，预警机实时解析坐标并分配火力，战斗机发射反辐射

谨防军事理论“创新之误”

■温鸿鹄 邹力

导弹精准摧毁目标，环环相扣形成闭环摧毁链路，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摧毁了叙利亚19个地空导弹连。智能化时代，军事理论研究正朝着集成创新、融合创新的方向迈进，应积极构建跨领域、跨学科、跨平台的军事理论协同攻关机制，吸收地方技术单位共同参与联合攻关，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作战人员一道论证，汇聚众智，造就紧贴实战、引领变革的创新理论。

谨防“纸上谈兵”之误，要实践检验。当前部分军事理论研究过度依赖模型推演和理论假设，缺乏真实场景的检验与修正，看似创新性强的作战理论，在真实战场环境中却频频碰壁，无法转化为真正的战场效能。“海神之矛”行动中，美军为保障作战行动成功，在训练基地1:1复刻作战现场建筑与地形，突击队员置身模拟战场环境，围绕机降、突击、安防与撤离等关键环节，展开多轮全流程模拟演练与细致复盘。唯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作战理论，才能在真实战场上发挥作用，应综合运用技术仿真、实兵演习、实战检验等多种手段，对军事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验证，在“提出构想—实践验证—修正完善”的螺旋式上升路径中，创造出适应复杂战场、能够克敌制胜的作战理论。

加强空域协同规划设计

■许世勇

行器、炮弹等适用的空域高度合理进行划分，以满足各种力量对不同高度空域使用的需求，防止作战中空域协同出现矛盾和冲突。再次，要根据特殊需要划分。作战中，由于特殊需要常常划分一些特殊空域，以备特殊情况下使用。特殊空域划分，一方面可以采取预先划分，预留一定的特殊空域空间；另一方面也可在作战中根据特殊情况临时划分，满足空域临时需要。无论是预先划分还是临时划分，都应明确适用的条件、申请的程序以及恢复的时机等，确保满足特殊空域需要。

规划进出空域时序。科学规划进出空域时序，是减少空域协同矛盾的重要环节。应根据不同作战进程空域使用的需求，明确各类飞行器、炮弹射击进出空域的具体时间，以便建立安全、可靠、有序的空域协同关系，提高空域协同的时效性。一是明确进出空域时间。通常应根据空军航空兵、陆航等具体任务开始时间，确定各类飞行器进入空域的时间。当前一批次完成任务后，应继续规划下一批次或其他力量进入空域的开始时间。为确保飞行安全，每个进入空域的力量还应预留一定的安全期时间，以确保能够安全退出某一空域。二是明确用空持续时间。为了达成预期的作战目的，空域使用通常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为此应合理地规划空域协同的持续时间。对贯穿全程的空域用时，如保持制空权等，应结合具体任务进行专项确定。对阶段性或临时性用空，应按照各种力量、各类行动的用

空时间具体确定或明确。三是明确退出空域时间。空中各种力量、各类行动用空任务结束后，应适时退出或释放某一空域，以安排其他需要用空力量或行动继续使用该空域。退出空域时间通常应按照用空计划严格执行，并适时报告退出空域的具体时间等。作战中，如需延迟退出空域时间，应严格批准程序，以免造成新的空域冲突。

围绕重心协同空域。作战重心，往往事关作战全局的关键。空域协同必须紧紧围绕各作战阶段、节时的作战重心来展开，以便形成协同重点，确保各作战阶段、时节作战重心实现，达成预期的作战目的。一要突出关键行动空域协同。为周密组织各种空域行动协同，应首先确定该阶段、节时的关键行动空域，明确关键行动空域的起止、持续时间、高度、范围等，再次次确定其他配合作战行动空域协同问题，以确保关键行动空域的优先权，以此带动整个空域战场有序协同，提高空域协同效率。二要突出重要阶段空域协同。不同作战阶段，对空域使用的侧重点不同，应针对各作战阶段对空域使用的具体需求，确定空域使用的重点。除此之外，还需明确不同作战阶段空域协同转换的时限、高度、范围等，使不同作战空域之间能够根据作战进程进行有序转进、顺畅衔接。三要突出主战力量空域协同。主战力量用空是空域协同的重点，应予以优先保障。作战中，凡是涉及主战突击力量、保障力量、支援力量的用空应优先

规划设计，以确保主战力量用空得到最大限度保障，坚决实现主要方向、重点目标、主要作战目的的达成，持续推动作战进程滚动发展。

因势适时调整空域。作战中，根据战场态势变化适时调整空域协同的内容和重点，是提高空域协同效率和达成作战目的的必然要求。应结合具体作战实际和战场态势需要，因时、因敌、因己灵活调整空域，使各个空域更好满足作战需要。首先，要适时调整空域协同关系。随着作战进程发展，作战重心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随之需要对涉及的空域协同关系作出相应调整，如某阶段以近距空中支援为主时，则需要以中低空、低空空域为主，其他空域配合，才能更好地适应作战需要。在调整空域功能区时，应同步明确调整后的空域协同关系。其次，要精确调整空域协同高度。在面临空域使用冲突时，应针对不同飞行器、炮弹等实际需要，将空域进一步按照高度、间隔、批次等进行精确调整，以满足各作战力量对空域作战需求。除特殊情况外，调整后的空域应预留一定的纵向、横向安全距离，以避免同时使用空域发生新的冲突。再次，要灵活调整空域使用时限。在临机组织协调时，常常会面临空域临时使用问题，如延长空对地打击时间、申请某一作战力量临时进入某一空域等，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用空时间。但无论是延长用空时间，还是临时增加用空时间，都应严格审批，以免打乱整个空域的协同节奏和进程。

打出作战中的“差”

■高凯 卢晨昊

挑灯看剑

作战是双方利用一切物质条件来获取作战优势的智力角逐和力量比拼，双方指挥员不仅需要打出时间差、空间差，还需要打出决策差、行动差，才能获得更多优势“窗口”，进而掌握战场主动权。

通过更快速度打出“时间差”。“时间就是军队”，无论是我国兵家所遵循的“兵贵神速”，还是外军强调缩短“OODA”作战周期，都力求在时间上取得对敌之优势。在相同的空间距离上，速度越快时间越短，想打出“时间差”，就需要拥有更快的速度。一方面，通过提升机动速度来实现。高速机动可以通过兵力兵器快速集结和位置迅速变化，实现战场兵力兵器态势迅速改变，从而形成优势兵力主导战场。另一方面，通过加快打击速度来实现。这也是为何世界军事大国争相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原因。通过极致的速度能够让敌无法有效发现、跟踪和拦截，难以有效应对。

拓展更远距离打出“空间差”。现代战争维域不断拓展，想实现“降维打击”就需要拥有比对手更多的活动空间，谁的“胳膊长”就能更加有效地控制距离、打击对方。拓宽有形作战空间，要通过增大武器平台射程实现打击距离的尽远覆盖，也要通过将作战空间向深海、太空拓展加以实现比对手拥有更加广泛立体的空间，以打出有形“空间

差”。发挥无形作战空间效用，要依托传输更深、更远的网信通联体系分布部署作战力量获取更多空间资源，也要运用信息、网电等力量对敌网络信息体系进行打击，压制效能发挥、压减对手距离，打出无形“空间差”。

处理更多数据打出“信息差”。想发挥出比对手更多的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就要在作战认知上强于对手，获得比对手更多更有效的战场信息数据。要注重指战员发散性、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培养，面对战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对手编织的“信息茧房”时，能够打破思维定式和局限。要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比对手更快地收集、破译、处理情报信息，依托人工智能、现代通信技术，构建“智能参谋”群体，让指战员集中精力于战场态势研判、定下作战决心等关键环节上，通过技术“减负”让信息流加快，缩短“OODA”循环周期。

做出更优决策打出“行动差”。现代作战是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的并行式作战，指挥员需着眼在“平行空间”中决策更多、更优行动，进而打出“行动差”的特点，将决策与行动末端直接相联，减省决策上传下达以及反馈造成的不必要消耗。要运用任务式指挥方式，由末端实施者基于决策者意图，根据战场态势发展变化，灵活自主调控作战行动，进而形成对敌的行动优势。